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光 主编

刘宗周

Liu Zongzhou
Yu Jishanxuepai

与蕺山学派

何俊 尹晓宁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宗周与蕺山学派/何俊, 尹晓宁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阳明学研究丛书/吴光主编)

ISBN 978-7-300-11340-1

I. 刘…

II. ①何…②尹…

III. ①刘宗周 (1578—1645) - 哲学思想-研究②哲学学派-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B248.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189 号

阳明学研究丛书

吴 光 主编

刘宗周与蕺山学派

何 俊 尹晓宁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17.5 插页 2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3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一

刘述先*

浙江一向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明代，王阳明提倡心学，挑战流行的官学（朱学），风行一时。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回到故乡，自此广收门徒。据黄宗羲《明儒学案》，阳明收徒首先在浙中，然后是江右（指江西，《止修学案》括入）、南中（指江苏，《泰州学案》括入）、楚中、北方、粤闽。浙中人数不多，但钱绪山、王龙溪影响深远。梨洲对江右评价特高，竟谓：“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但江右虽人才众多，却并无统一观点，梨洲特别表扬聂双江、罗念庵，显然别具用心，这里面牵涉到许多问题需要考察。泰州派的问题更大。梨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归根结底，不外蕺山所谓：“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很明显，由蕺山的观点来看，泰州是“参之以情识”，龙溪是“荡之以玄虚”；蕺山之学则乘王学之流弊而起，这便是梨洲写《明儒学案》的背景。至于楚中，梨洲以楚学之盛，

* 刘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于上海。台湾大学学士、哲学硕士，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东海大学讲师、副教授，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哲学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1974—1981），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81—1999），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讲座教授（1999—2004）。现任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等职。著作有《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等20余种，并有英文论文60余篇及著作多种。

唯耿天台一派，自泰州流入，评价不高。王门在北方与粤闽则缺少发展，可以从略。

有了以上的背景，我们乃可以找到一条统一的线索来看吴光教授策划与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其内容包括专著十部，论文集一部。自1981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国际宋明理学会议以来，浙江就是研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重镇。^①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这套丛书正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专著十部，首先是董平著《王阳明的生活世界》，从对阳明生平的阐述中，展示阳明生活世界的变化与思想世界的演进。接着钱明著《浙中王学研究》，徐儒宗著《江右王学通论》，吴震著《泰州学派研究》，对王门的三个重要流派作出了深入的省察。然后是何俊、尹晓宁合著的《刘宗周与蕺山学派》，由此可以看到梨洲虽对蕺山之学大行于世抱有很高的期望，结果却事与愿违。到了清初，发生典范的转移，梨洲成为心学的殿军，不期而然促成了“达情遂欲”、“力行实学”、“文献考据”的转向。吴光著《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探讨了梨洲的学术成就，从而肯定了他之作为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然而丛书并不局限于儒家的视域。朱晓鹏著《王阳明与道家道教》，陈永革著《阳明学派与晚明佛教》，爬梳了史料，揭示了阳明学与道家道教以及晚明佛教（包括“狂禅”）的关系。同时阳明学又不只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还具有现代意义。刘宗贤、蔡德贵合著的《阳明学与当代新儒学》，具体探讨了阳明心学的内在发展——现代新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鼎足而三）的思想特质及其与阳明学的思想联系。丛书还包括了韩国学者崔在穆著《东亚阳明学》的中译本，展示了一个跨国界的开阔视野。最后《阳明学综论》收录了当代多位著

^① 自1981年至今，浙江学界举办过多次关于叶适、陈亮、吕祖谦、刘基、王阳明、黄宗羲等宋明理学家以及浙东学派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举办了“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省一级学会“浙江省儒学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和《儒学天地》杂志以及《当代儒学的发展方向》、《继往开来论儒学》等专题论文集，还有多部儒学论著，从而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与肯评。

名阳明学专家所撰稿，并汇集参与本系列研究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论文，编为论文集，希望能在阳明学研究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2009年6月10日序于台北

“阳明学研究丛书”总序二

吴 光

1984年至1991年间，我有幸担任了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负责组织策划并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王阳明、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研究”，主持了《黄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等多种古籍的整理校点工作。本来还计划组织一套“浙学资料汇编”和一套“浙学研究丛书”，但由于某种非学术的原因干扰了这一计划的贯彻落实，致使当时的我在离职感言中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但到2000年前后，形势变化，我再次被委任为本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继而担任主任。于是，与时任哲学研究所所长董平先生共同策划、分工合作，由他负责主持“阳明后学研究资料丛刊”的课题^①，由我负责主持“王阳明与阳明学派系列研究”的课题。后来，由我主持的课题先后得到浙江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立项成为浙江省2001年度社科规划重大课题和国家社科基金2002年度规划课题。我们的课题组12名成员经过7年的艰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套包括9部专著、1部译著、1部论文集，总计11册约300万字的“阳明学研究丛书”。丛书完成后，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支持，提供了出版补贴；又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① 本课题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立项成为本院2000年度重大课题并提供出版资助，最终完成了一套由万斌任主编，钱明、董平任副主编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10册），由凤凰出版集团于2007年出版。

予以出版，使著者、编者的辛勤劳动得偿所愿，也可谓学术之幸也。

以往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成果，偏重于对王阳明本人及王阳明学说本身的解说，而缺乏对阳明后学各派的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既没有组织集体力量进行系列性的大课题研究，更没有出版过系统梳理和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学术思想的系列丛书。然而，深入研究王阳明与阳明后学各家各派的思想宗旨、学说特色、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深入研究阳明学与道教、佛教以及明清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当代儒学、东亚（日本、韩国）阳明学之间的思想联系，深入研究阳明学与建设现代精神文明的关系诸问题，不仅对于系统整理中国哲学遗产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多元和谐的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们设计本课题的初衷，一是要自觉担负起作为阳明学发源地和发展重镇的浙江学者的历史使命，对阳明学的发展演变作出系统性的思想史的总结，向国内外读者奉献我们系统探索王阳明及其后学各派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与角度揭示阳明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与现代意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多元和谐新文化而贡献我们的知识与心力。本丛书的各项具体成果，基本上实现了这一初衷。

本丛书研究的主要思想是：第一，通过对王阳明的生平事迹及其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目标、“知行合一”为方法的学说思想的综合研究和客观评价，力求使当代读者能够全面了解王阳明的学术贡献，正确认识王阳明学说的理论内容、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第二，通过对阳明学内部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具体研究和比较研究，理清阳明学形成、发展、分化、演变乃至衰落、复兴的历史过程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三，通过对王阳明以后的明清以至当代儒学与阳明学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探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特点与规律，进而探索阳明学在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与现代意义；第四，通过对阳明学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社会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不同命运、不同历史作用的比较研究，探索思想文化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辩证关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为建设现代精神文明提供有意义的历史借鉴。

本丛书特色在于，它是对王阳明及其后学各个思想家思想学术的个案分析与阳明学各学派和宋明以来心学思潮研究相结合的系列研究课题。其内容体现在各位课题参与者撰写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中。本丛书的选题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人物大传，主要是论述阳明学派三大儒（创教者王阳明、修正者刘宗周、转型者黄宗羲）的生平事功与学说思想，附论其所创立的学派（姚江学派、蕺山学派、浙东学派）之概况与特色；二是专题研究，本丛书选择了阳明后学三大派（泰州王学、江右王学、浙中王学）以及王阳明与道家道教、晚明佛教、当代新儒学三专题进行系统化的分析研究；三是比较研究，既有阳明学内部诸学派的比较研究，也有阳明学与明清佛学、道家道教以及东亚（日本、韩国）阳明学的比较研究。通过这些成果，大致展现了王阳明及其后学各派的思想内涵与学派特色，展现了阳明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对中外儒学思想史的重大影响。

我相信，读者从本丛书各部著作与专题论文中，可以看到作者艰辛劳动的收获，可以分享作者闪烁智慧之光的学术成果，还可以获得弥足珍贵的思想启迪。此言虚乎？实乎？还是敬请读者深入丛书内部一探究竟吧！

2009年7月25日识于朝晖力行斋

导 言

宋明儒学的主旨是确认道德价值的本体化，以及在个人与社会生活中的落实。程朱理学一方面通过天理的标示与论证，完成了道德价值的本体化，另一方面通过四书学对五经学的取代，理学的世俗化与意识形态化等一系列努力，复使道德价值贯彻于个人与社会生活之中，从而在 12、13 世纪基本完成了其建构，并获得了儒学正统的地位。但是，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性确立，道德价值本身却遭失落。作为程朱理学的反动，王阳明心学以致良知的揭示，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窠臼，使道德价值重新植根于人的自主意识与行为中。然而，阳明心学的泛滥，致使植根于人的自主意识的道德价值因其相对性而流于虚无化。在晚明的儒学流变中，逃禅成为这种道德价值虚无化的显著注脚，即使纠弹阳明心学、力返朱学的东林巨子高攀龙也难逃半杂禅学的指责。出入于朱学与阳明学的刘宗周，继承了阳明将道德价值植根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致良知思想，以“独”、“意”构成心体的内涵，同时强调“独”、“意”具有善的指向性，并以“妄”的提出予以反衬，从而抛弃了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命题，使相对性极强的“独”、“意”上升为本体而恢复其客观性。但是，由于“独”、“意”本身并不是不动的实体，而是极具变动性与成长性的意识，因此，如何使这个意识性的独体在其呈现于人的活动的过程中真正成为善？刘宗周吸纳了朱学持敬的思想，兼摄晚明流行的格过实践，创造性地将朱学的正向持敬转化为反向改过，以克己改过的践履始终规范主观意识的客观呈现过程。《人谱》成为刘宗周哲

学的浓缩写本。虽然从宋明儒学的主旨和朱学、阳明学的演变轨迹与趋向而言，刘宗周的哲学极好地解决了难题，不仅确保了宋明儒学的主旨，而且也回应了包括天主教在内的晚明学术思想，成为宋明儒学的殿军。但是，将源自社会历史的道德价值归于自我意识以及个体修身的旧路数应用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实已无力挽救道德价值的迷离与失落，道德价值的重建必须另辟途径，清代学术转向知识诉求乃至近现代中国文化追求从体到用的全方位改革，实质上都反映了对宋明儒学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刘宗周的哲学也意味着凭恃哲学思考与个体修身为主导来建构道德价值的宋明儒学的终结。

今人对刘宗周及其蕺山学派的关注约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姚名达编纂的《刘宗周年谱》1931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它对刘灼编订的《年谱》做了充实和修正，使得刘宗周的生平和学术得以较清楚的展现。1948 年，唐君毅《泛论阳明学之分流》一文引发了他和老师熊十力关于“意”与“诚意”的辩论^①，二十多年后，他续写《刘宗周道德心之学说与实践及其对于王阳明之批评》^②一文，进一步申论他对刘宗周哲学的看法。唐君毅的观点为后来许多学者认同，刘宗周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也日渐凸显。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冈田武彦完成了《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一书，其最后一章专论“东林学和刘蕺山”，对蕺山之学做了深入的体察和分析。冈田武彦认为，刘宗周通过对“独”、“意”的把握，实现了心、性、情、理、气的统一以及本体与工夫的合一。冈田武彦所论，可谓抓住了蕺山之学的关键。

1979 年，牟宗三出版了《心体与性体》的续篇《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此书最富特点，也最引起争议的是牟宗三将刘宗周纳入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中，提出了五峰蕺山系、象山阳明系、伊川朱子系的“三系说”，从而凸显了刘宗周宋明理学殿军的地位；同时，牟宗

① 参见郭齐勇：《论熊十力与唐君毅在刘蕺山“意”与“诚意”观上的讨论与分歧》，《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

② 该文英文原名为“Liu Tsung-chou's Doctrine of Moral Mind and Practice and His Critique of Wang Yang-ming”，又被译为《刘宗周的道德心学说、实践及其对王阳明的批评》。

三以“以心著性，归显于密”概括刘宗周的哲学，使刘宗周哲学的基本精神得到彰显。

对牟宗三的判定，他的学生杜维明不以为然。他认为：“牟先生对宗周的了解依然还有隔。”^①杜维明曾在1980年代初发表了《刘宗周哲学人类学中的主体性》一文，阐述了他对蕺山之学的基本观点。在这篇论文中，杜维明并不只是将刘宗周的哲学视为“对王阳明挑战的回应”，而更着重于揭示刘宗周是“中国17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②，他以“很多新见的原创性思想”，指明“主体性如何成为刘氏自我概念的中心问题，亦即人格的内核，用微妙精细而且完全自觉的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质量”^③。显然，这篇论文以其崭新的学术视野为刘宗周哲学的理解开启了新的维度。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大陆学界对宋明理学的重新认识，刘宗周哲学也渐为学界关注。期间，最具代表性的是袁尔钜出版了大陆学者研究刘宗周的第一部专著《蕺山学派哲学思想》。^④此书从明初哲学思想谈起，首言蕺山学术的渊源脉络，继言蕺山及其主要弟子的思想，最后论及蕺山学派的影响及传人；同时，又将刘宗周的思想与同时代的高攀龙、黄道周、邹元标、冯从吾、陶奭龄等人的思想做比较，以期反映刘宗周哲学的特性。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两岸学界开始合作研究刘宗周。这项合作研究以点校《刘宗周全集》（共五卷六册）为基础，对刘宗周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专题研究，曾先后举办了四次“刘蕺山学术思想讨论会”，最终由钟彩钧主编为《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共收两岸学者论文19篇，分涉哲学、经学、史学多个门类，成为这一时

① 《杜维明学术专题访谈录：宗周哲学之精神与儒家文化之未来》，184～18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② 杜维明：《刘宗周人类学中的主体性》，《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③ 同上书，96页。

④ 参见詹海云：《大陆学者对蕺山学术思想的研究》，《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595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

期刘宗周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此外，1997年，王汎森发表了《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一文，对刘宗周之后蕺山学派的状况做了清晰的勾画和深入的分析；而东方朔（林宏星）出版了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刘蕺山哲学研究》，从理气论、心性论、诚意论、慎独论四个层面对刘宗周哲学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析；次年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版了《刘宗周评传》。2000年，李振纲出版了修改后的博士论文《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沿着牟宗三“归显于密”的概括对刘宗周哲学的精神特质作了进一步论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刘宗周哲学思想自身逻辑的分析与重构仍是最基本的关注，只有少数研究能将哲学家的思想置于历史的场域中结合他的行动来加以考察。我们希望在后一个方面做一点推进。刘宗周的思想分析虽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关注，但我们试图延伸到对人的研究，期望藉此能较完整地呈现出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刘宗周的人格结构的影响，以及他的人格结构与他的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由于分析的需要，我们不无冒险性地引入了心理学的方法。用心理学解释哲学家及其思想的心理机制，是我们的一次尝试，是否全面和准确确实有待批评。我们尝试着用心理学中的人格结构的内部机制来解说刘宗周的心性哲学，力图使研究从哲学延伸到心理与行为，对刘宗周的理解从意识层面深入到他的无意识层面，从而使整个研究在三个维度上展开，以冀更真切地体认他的思想。

全稿的结构亦因此而形成。首先分析刘宗周心性哲学的来源、主旨、工夫以及特色，以获整体性的梳理与把握。续论《人谱》。《人谱》是刘宗周哲学最重要、最严谨、最完备的表达，然而许多研究往往将其思想散入各相关主题，支离不全，难见精神。我们以此专章构成本稿的枢纽部分，承上启下，既由它总括刘宗周的思想，为上文作结，又由它透见刘宗周的人格，下开后文的心理学解析。最后是描述刘宗周的行为特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刘宗周及其气象，以及他的自杀，从而观照他的哲学。

按照丛书主编的要求，蕺山学派是本书必须关注的另一个内容。该学派的盛衰是明清易代之际学术风向转变的缩影，王汎森、方祖猷等人对此有过很好的研究。基于他们的研究，我们将重点放在梳理刘宗周去世之后学派内部诸系的情况，分以张履祥、陈确和黄宗羲为例，通过他们对蕺山之学的取舍，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来解释蕺山学派分裂和没落的内部因素。至于该学派分裂的外部因素，王汎森的文章已经有了很深入的分析，本书不再赘述；蕺山诸弟子不属师学、各自独立的思想，我们也不予讨论。

刘宗周的生平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宗周，生于明神宗万历六年戊寅春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578年3月4日）卯时^①，卒于清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八（公元1645年7月30日），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水澄里人。因18岁应童子试时纳卷者误以字为名，此后他便以宗周为名，以起东（一作启东）为字了。和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刘宗周也有比较多的名号。因他后来迁居至蕺山之下，遂自称蕺山长、蕺山长者、蕺山长病夫宗周等等，其弟子也因此尊称他为蕺山夫子，后学则尊称他为蕺山刘子、子刘子，“蕺山学派”的得名亦本于此。

人的名号常透漏出一些信息。刘宗周的一些名号就是他思想倾向的反映。比如，刘宗周有一个别号“读易小子”，说明他对易学有偏爱，他的很多哲学思想便是根植于易学的；他还有个别号“克念子”，这是他晚年的一个名号，从中可以看到晚年刘宗周“慎独”、“诚意”说确立后对待“念”的态度，以及他的日用工夫。刘宗周的名号同样反映着他的情绪。刘宗周是一个遗腹子，其父刘秦台以痢疾卒于其出生前五个月，为了怀念父亲并表达没有见到父亲的哀痛，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念台，所以也有学者称他念台先生，一些友人也因此称他为念台子。而他的另外几个名号则反映着他的心境，比如秦望、望中山人、还山主人、山阴废士等。^② 这些名号在幽雅自足中夹杂着些许无奈，泛着淡淡的隐忧。

^① 刘宗周的八字比较奇，《年谱》中特地标出，为“戊寅乙卯，戊寅乙卯”（《刘宗周全集》第5册，83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

^② 参见《刘宗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5册，72~73页。

从刘宗周的儿子刘洵给他编的《年谱》以及刘宗周为自己的家族人士撰写的行状和墓志铭看，刘宗周的童年经历是很艰苦的。他出生时其父刘秦台已经去世五个月，祖父兼峰公不善经营，以至“家计寝落，室空如洗”，“炊烟屡绝”。母亲章氏只好时常带着刘宗周就食于外祖父家。后来，刘家干脆连庐舍也卖给了族人。母子二人无处栖身，章氏只好带着襁褓中的刘宗周永归母家，靠纺织自给，清贫度日。

万历十二年，7岁的刘宗周开始读书，10岁时师从外公南洲公。南洲公自己虽屡试不中，很不得志，但却是一个善于启发的老师，督教也甚严，在当地很有些名气，周宁宇、陶石簒等皆出其门下。“（南洲公）性刚毅，善启发。而豪于饮酒，每旦授书毕，辄扃学舍，出饮里中，诸生皆乘机逸去，先生独留，坐读自若。及公归考课，诸生并受箠箠，而于先生一无所施。公居恒称曰：‘甥必有成。’晚膳时每琅琅谈古人忠孝节义不倦，先生倾耳而听，心窃慕之，以是少成而庄，卓荦有圣贤志度，耻为干禄之学。夜则傍太夫人读，机杼之间，篝灯相向，咿唔声与组织声恒相错也。”^①看来刘宗周早年虽穷苦，却有很好的读书条件。可是自万历十七年之后的五年，刘宗周的求学经历却充满了艰辛。《年谱》记载：

时南洲公以仲子萃台公司教寿昌，业与偕行矣，恐先生废学，命往读书，太夫人欣然遣行。从者匿资斧，酷暑中徒步九十里。甫达，困甚，挛一足，昼夜楚者五阅月。公不得已，携先生归。明年春小愈，复遣先生往寿昌。顷之，患目眚，经年而愈，复随公归。又明年，侍公之寿昌，仍病目，小间，受公《易》。又明年，萃台公以迁官去任，先生离寿昌，年已十六矣。先是，萃台公试先生以文，阅之喜，谓室人宋曰：“刘甥令器也，乃父为不死矣。”南洲公以年幼迟之，及归自寿，始课以文。五年中凡三至寿昌，道千里而险，又屡攫奇疾，即旁观者

^① 《年谱》，《全集》第5册，91页。

翘舌，而太夫人不加姑息，冀先生终于学。顾先生以疾故，仅得之口吟卧听之余。^①

这段艰难的日子可以说是对刘宗周意志的一种磨练。师长们的严于督教，加上自身的努力和天赋，使得他学业大进，并为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刘宗周 19 岁时娶表妹为妻，次年春，补绍兴府学生，秋八月即中浙江乡试第 42 名，为举子，声名渐隆于乡里。万历二十九年，24 岁的刘宗周入京师应礼部会试，中第 129 名，殿试三甲五名，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最可哀悯的是刘宗周的母亲章氏已于当年二月病卒于家，并没有听到儿子中进士的喜讯。刘宗周于放榜的第二天得闻讣讯，恸哭几绝，星夜南奔，回家之后守制了三年。

万历三十一年，尚在家守制的刘宗周经人介绍拜谒了德清大儒许孚远，并北面称弟子。许孚远字孟仲，是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克己为要”，他克己工夫之清苦会让人想起薛瑄（文清）。从学脉上看，许孚远虽受阳明学影响，却非阳明后学，也对阳明部分后学认良知为现成的观点很不满，并曾和周汝登有过一次有名的辩论。师事许孚远对刘宗周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能够更加深入到当时的学者群内部。虽然刘宗周并不完全墨守许氏家法，但其学问的确是在许孚远“克己”之学处立定脚跟的，此一路数也深合刘宗周的秉性。其孙刘士林谓“（先生）生平以学业推服者，许恭简公一人而已”^②，就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

万历三十二年，刘宗周守制已满，诣吏部谒选，除授行人司行人。他在北上途中路过德清，再次拜见了老师许孚远。“孚远论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因追溯平生酒色财气分数消长，以自考功力之进退。先生为之猛省。”^③ 蕺山之学重践履的特色或与此次拜谒有

① 《年谱》，《全集》第 5 册，92～93 页。

② 《蕺山先生行实》，《全集》第 5 册，711 页。

③ 《年谱》，《全集》第 5 册，114 页。

关。刘宗周没有想到，此次见面竟成了师生间的永诀。是年七月，许孚远病逝。也是在这一年，顾宪成于无锡创建东林书院，大会四方之士，天下渐起波澜。

初入官场的刘宗周并不深谙此间世故，常以龙逢、比干自期的他不久便开始卷入政治旋涡，也冒着风险上书弹劾当国者沈一贯和给事钱梦“朋党乱政”。他当时的一个友人曾以老亲之故劝他不要冒此风险，刘宗周遂上疏请告归，并获得了批准。不久，刘宗周便连遭大故。先此，老师许孚远病逝，次年外祖父南洲公章颖病逝，又次年，祖父兼峰公病逝。自是以后的几年，暂时远离了官场的刘宗周在老家过着平静逍遥的乡村教师生活，直至万历三十九年，34岁的刘宗周才起复原官。

万历四十年，起程北上复职的刘宗周路过梁溪，拜见了当时名满天下的学者高攀龙，开始了和东林人士的深入接触。高攀龙长宗周十六岁，和刘宗周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和此前与刘宗周过从甚密的东林人士刘永澄一样，也是刘宗周认为和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道友之一。虽然关于此次会见的《问学》三书由于时局动荡散佚不传，但毫无疑问的是，从此刘宗周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都更进一步地受到了东林人士的影响。《年谱》谓自是以后，刘宗周“益发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①。

刘宗周治世之心颇切，到京城不久即上疏指陈时弊，但因官微言轻而没有得到回应。是时，东林书院的再造者顾宪成已经病逝，但是朝堂之上所谓东林党和昆、宣两党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一片肃杀气象。刘宗周此时入仕不久，尚未卷入党争，只因与高攀龙、刘永澄等人的交往及对他们的了解，使他的言论更倾向于东林党。但他的持论还比较公允，在为东林人士辩护的同时，他也指出了部分东林人士借清议行惨刻不情之事，主张调和各派之间的争执。^②但是

^① 《年谱》，《全集》第5册，128页。

^② 参见上书，138～142页。